

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 40 年

李治亭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中国古代断代史中, 清史研究是起步最晚的最年轻的断代史。清亡后, 清朝的历史才为学者们所密切关注, 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清史研究热潮。1949 年后, 直到改革开放前, 各断代史研究热闹非凡, 已形成言必称秦汉、论必及唐宋的学术风潮, 但是清史研究显得格外冷清。1978 年, 改革开放改变了清史的命运, 清史再度复兴。迄今为止, 清史研究 40 年,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至少有 17 种以上的《清史》通史著作出版, 发表的论文也是数量甚巨, 达到 3.2 万篇之多, 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更是蔚为大观。同时, 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专业杂志的创办, 更使清史研究、满族研究成为显学。但是, 在取得学术共识的前提下, 各种学术分歧也不容否认。尤其是以“新清史”等为代表的错误认识, 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能否保持清史发展的势头, 将取决于我们对已出现的不足或弊病克服到何种程度。

关键词: 清史; 档案史料; 满族研究; 学术共识; 新清史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8) 08-0010-12

近年来, 屡见学者发表论著, 对清史的研究历程做阶段性回顾, 展示清史成果, 反映清史研究新进展、新成就。所谓阶段性, 或一年, 或若干年, 最长的时段, 以百年为期, 即指清亡 100 年, 如《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① 也有一周年回顾或数年研究的总结。^② 还有的学者将清史百年学术史写成专著, 系统地记述清亡后百年间出版的清朝断代史著作。^③ 除此之外, 清史中的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边疆史等, 也时有专门的阶段性回顾。“回顾”种种, 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 深浅由之, 其学术是非断与不断, 亦听“回顾”者之便。不管怎么说, “回顾”提供了清史学术的大量信息, 有助于了解清史研究的进度与近期现状, 对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必能起到引导的作用。今当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 回顾这一时期清史的研究历程, 展望未来, 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清史研究学术历程的起步与发展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封建王朝, 在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之后, 于 1912 年寿终正寝, 由此开启了清史研究的学术历程, 至今已有 106 年。若与清之前的明史、元史、宋史、唐史, 直至秦汉各断代史相比, 清史都是最年轻的断代史。百年清史, 自然形成两个大阶段。清亡至改革开放前, 为第一大阶段, 共 60 余年; 改革开放至今, 为第二大阶段, 计 40 年, 这正是本文将要阐述的内容。欲明近 40 年清史研究状况, 应先了解前 60 余年清史研究的来龙去脉, 前后对比, 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其中

作者简介: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 清史。

① 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 年第 1 期。

② 李治亭:《2016 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 5 期。

③ 刘海峰:《百年清史纂修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 年。

的变化,分清高低、优劣之别。

清亡后,原先的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禁忌顿时解除,清朝的历史,可以不受限制地为人们所议论,更为学者们所关注,纷纷书写它的历史。文艺界以清史为题材,或写小说,或编成戏剧等,所有这一切,表明清亡后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清史研究的首次热潮。其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民国政府于1914年设清史馆,按着中国传统惯例,为已亡的清朝修一部纪传体史书——《清史》。10年后修成,可惜,未及定稿,就以《清史稿》的名义正式出版了。其二,肖一山个人所作《清朝通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采用西方章节体,对中国史学传统来说,无疑是一次学术创新!除此之外,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表明外国学者对清史的关注,再现国外学者心目中的清史全貌。延至20世纪30年代,即清亡20余年后,又有孟森作《清史讲义》,可以视为这一阶段短暂的清史研究热潮的告终之作。这一时段的清史研究著述,并非仅仅以上所举几种,还有《清史讲义》(周退舟)、《清鉴纲目》(印鸾章)、《细说清朝》(黎东方)等,包括日本人著清史,共有10余部清史问世。流传至今,也只有《清史稿》与肖氏《清代通史》及孟氏的《清史讲义》这三部著作仍是清史学界必读之书。自孟氏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除偶有研究清史具体问题的论文发表外,并无清史整体或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

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清史似乎已被遗忘,在清史之外,已形成言必称秦汉、论必及唐宋的学术风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就中国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等专题展开大讨论,把相关王朝史带进其中。于是,这些王朝的研究红红火火,热闹非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史显得格外冷清,几乎无人问津,但清史的另一半——近代史却红得无可比拟!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等,妇孺皆知,人们只知道近代史而不知有清史!从科研机构到高校,近代史已成必修课,它已超出学术范畴,变为政治教育的活教材。在这一历史时期,实际上近代史已取代清史,而清入关前史、满族史,乃至清入关后的历史,包括康乾盛世等,很少有学者研究。当然,清史并非绝对无人光顾,如20世纪60年代初,刘大年发表论文《论康熙》;^①1970年代前后,与苏联从文斗到武装冲突,引发我国学者开始转入沙俄侵华史研究,如康熙时两度发起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俄尼布楚谈判与定约等,都是清前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反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图谋,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这仅仅是清史的个案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自前期以肖一山为代表出版《清朝通史》上下卷之后,在这一时期,40年间,竟无一部清朝通史之作。

改革开放前的清史领域一派沉寂,在断代史研究中地位不显。国内著名的学者,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侯外庐、邓广铭、白寿彝、周谷城等一大批史学家,都是在中国通史或清史以外的断代史研究领域享誉海内外的学者;诸如刘大年、黎澍、李新、胡绳、罗尔纲、章开沅、林增平、戴逸等,则都是近代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再看清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如杨向奎、郑天挺、傅衣凌等,其学术影响远未超出清史学界之外。只要稍作比较,清史研究之不足,就显而易见。这也难怪,中国的清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还不到70年。无论学术积累、人才培养,都无法与其他断代史相提并论,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也是正常现象。清史研究的落后状况,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需要强调的是,其短时间改变之难,除了以上一些客观原因,主要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不重视清史,总以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特别是“近代史”中的清朝,简直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受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影响,学术界研究清史的底气不足。这就是观念和认识问题,不正确认识清史的价值,就不能平等看待清史与其他断代史。1978年,伴随着思想解放、观念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清史。改革开放改变了清史的命运,清史研究再度复兴。最能反映清史研究的复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事例,莫过于1982年春夏之交,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清史学术研讨

^① 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会。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共同组织策划了这次空前的清史盛会，共有180余位学者与会，还有许多学者争要名额而未果。与会学者，从东北、内蒙、西北、云贵、两广、江浙、两湖、四川、中原各地云集渤海之滨北戴河。当时的清史研究学者绝大多数来自高校，原因在于高校为教学之需，必须将清史作为一门断代史课程来讲。但是，关于清史的研究却尚未开展，也从未举行过大型学术研讨会，清史专业领域的学者彼此处于失联状态。这次研讨会是清史学界整体向全国“亮相”，第一次把全国各地清史研究机构和学者联系和组织了起来，为未来清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在此次研讨会将要结束时，应与会学者的要求，将此会定为首届，而第二届会议，也决定由辽宁方面承办。直至2017年，在苏州举办第17届，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持续召开将近40年。除此之外，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还不定期举办清史重大专题的国际性研讨会，如1984年在大连、1988年在长春、吉林市等地举办，邀请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参会。

通过举办各种层次、不同规模、不同专题的研讨会，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地区封闭状态，密切了国内清史学界的学术联系。尤其跟日本的清史与满学学者的联系更为密切，相互访问与合作已成常态，清史由此走向世界。与此相适应，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选择清史专业，还有一些人转行到清史，遂使清史研究人员猛增，队伍日渐扩大。许多高校与地方政府纷纷增设清史研究机构。同时，与清史密不可分的满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也随着清史研究而复兴繁荣，主要是在满族的故乡东北地区及北京等地，纷纷创建满族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几乎每所文科高校，都有学者从事清代专题专项或一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如在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地，清代的民族问题、土司改流的问题，都是这些省区学术研究的重要历史内容，当地高校与研究机构都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些特殊部门或机构，如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故宫博物院、山东曲阜“三孔”等，自然是有特色的清史研究基地。国内的清史研究机构还拥有多家专门刊物，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从40年前的内部油印本，发展到今日国内一流的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论丛》，每年出两期，已创刊30余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明清史论丛》，每年出一期，也已创办30余期。还有沈阳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办院刊，都是国内发表清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而辽宁省委创办的《满族研究》，已创刊近40年，与清史融为一体，成为以满族历史研究内容为主的特色期刊。

二、40年来清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衡量任何一个学科或一个学术领域，是否取得进展，是否领先于同类学术，主要还是要看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多少，学术水平达到何种质量。

自肖一山于1923—1924年出版《清代通史》后，到改革开放前的50余年中，再无清代通史之作。直至改革开放伊始，鄂世鏞等多人撰写的《清史简编》于1980年出版。全书不足40万字，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清代通史。稍有学术影响的清史专家学者，尚无编写一部超越肖一山之作的意识，可见，当时清史研究的学术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以编清史为难。不管怎么说，这个“简编”的清史出版，^①改变了半个多世纪无清史通史性著作的局面，实有开创之功！稍后，由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册于1980年出版，第二册于1984年出版，该书只写到鸦片战争前，尚不足以称清朝全史。^②此后，以郑天挺的名义、实由其弟子撰写的《清史》上编，在198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又出版了下编。

① 鄂世鏞等：《清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以上 3 部清史, 还都是“简编”“简明”, 内容尚欠厚重。1993 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全史》, 共 10 册, 300 余万字, 比以上 3 部书的总和还要多, 从字数论, 仅次于肖一山的《清代通史》400 余万的规模, 是大陆学者编写的最大的一部清史著作。2002 年, 恰逢清朝逊国 90 年之际, 李治亭主编的《清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著分上下两卷本, 总字数 140 余万, 介于上举之肖著与王戎笙等著之间。截至 2015 年, 还有 8 部详略不一的《清史》出版。^① 其中周远廉自著《清朝兴亡史》共 5 册, 达 250 多万字, 是迄今仅次于王戎笙等著《清史》的第三部清史长篇。

以上所举关于清朝的通史性著作共 12 种, 都是采用章节体写成的。此外, 还有编年体《清史》, 一是戴逸与李文海两位先生主编的《清通鉴》, 多达 700 余万字;^② 二是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 共 400 万字;^③ 三是李文海主编的《清史编年》, 全书 600 余万字。^④ 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体例之一, 也被清史学者用于修清史。由南炳文、白新良主编的《清史纪事本末》, 共 300 余万字, 于 2006 年出版。^⑤ 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⑥ 书名虽然未用“纪事本末”, 但实际上就是用纪事本末体编写的。不过,《清朝通史》全书并未统一采用纪事本末体, 全书 12 册, 其中 10 册是采用纪事本末体, 有两个部分则用了编年体和图录体, 所以, 又把这套书称为“综合体”。举凡中国历代传统修史的体例, 在当今学者编写清史时, 无不得到充分利用, 以不同的体例, 再现清史的全部历程。

在不到 40 年中, 大陆学者共出版了 17 部长短不一、详略各异的清朝通史, 总字数达到 3300 余万, 这与二十四史字数的总和不相上下。更可喜的是, 党中央决策, 组织全国清史专业人员, 为清朝再修一部超出《清史稿》的新《清史》。2002 年 12 月, 正式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以戴逸为主任, 从全国选定 25 名知名学者为委员, 具体实施编纂计划。从第二年春开始, 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此次编纂修史, 是承接我国二十四史之传统, 又反映当代写史的特点, 设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个大部份, 构成这部《清史》的基本内容。从那时到现在, 动员全国清史、近代史的专家及部分辅助人员, 达 1500 余人, 历时 12 年完成初稿。近 4 年来, 再经一至三审稿, 目前正陆续送到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稿, 总字数达 3500 万。

除清朝全史或通史外, 清史研究成果中还有其他断代史所不曾有的“阶段史”。何谓“阶段史”?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如清入关前史, 即指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复仇为开端, 至清军入关的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 共 61 年, 是为清创业史, 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可以独立展开研究。1981 年周远廉率先于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清朝开国史研究》, 稍后, 在 1986 年又于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清朝兴起史》。近年来, 阎崇年撰《大清开国史》三卷本; 2017 年冬, 朱诚如、白文煜主编五卷本《清朝前史》, 共 257 万字, 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阶段性的清前史成果, 比诸其他断代史全史还要多, 显见清史研究的势头已居领先地位。历代王朝中, 也有一些王朝历经艰难创业而获得统治权, 如汉、唐、元、明等, 但其创业时间都没有清历经入关前 61 年之久, 入关后又经 18 年才最后统一全国(除台湾)。仅以入关前史而言, 历时较久, 内涵丰富而独特。改革开放前的数十年中, 几乎无学者问津。清前史冷冷清清, 似已被人们遗忘。迟至改革开放后, 陆续推出几部大著, 才填补了这一时段历史的空白。又如,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 134 年, 正好占清全史 268 年的一半。这是清代最为繁荣的时期, 被称为“康乾盛世”, 时限

① 这 8 部清史是: 杜家骥:《清朝简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华言实:《大清王朝全史》,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年; 马文作:《清朝全史》,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史东海:《精编清朝全史》,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刘毅:《清朝全史》,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年; 郑永安:《清朝全史》,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张杰:《清朝三百年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周远康:《清朝兴亡史》,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年。

②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③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年。

④ 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⑤ 南炳文、白新良主编:《清史纪事本末》,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⑥ 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

百余年。这段历史,一则内容极为丰富,二则足资思考,提供借鉴,其认识价值重大。故引起学者重视,展开专题研究,发表一系列论著。^①

又如,晚清史即中国近代史,构成了又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之多,前已说明,早已成倍地盖过清史,但在改革开放时期,“近代史”的研究势头远不如清史来得迅猛,却仍在继续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学术观点及价值判断正在进行调整,如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近代化等问题的评论,对洋务派重要人物的评价,都发生了与改革开放前大为不同的变化。

清史研究,以人物研究为盛。历史人物从来就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一部好的名人传记,实则是人生教科书,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改革开放初期,清代人物传记捷足先登,率先走向社会。如杨国桢的《林则徐传》,^② 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③,后者以79 950册的发行量,创下了同类传记的最高发行纪录,并且很快再版,总计发行量近10万册。同年,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④ 出版,稍晚,滕绍箴出版《努尔哈赤评传》。^⑤ 1984年,孙孝恩的《光绪评传》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冯尔康的《雍正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孟昭信的《康熙大帝全传》,^⑥ 以及其后的周远康著《乾隆皇帝大传》^⑦ 相继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清帝传记的编写。1993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总其成,出版了清朝十二帝的“列传”。

与此同时,全国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清帝传,以至一帝少则两传多则三、四个传,或五、六个传,传记最多的当首推《乾隆传》,多达8种。清帝传被重复编写、重复出版,仍然为读者所接受,显见人物传受欢迎的程度。除了皇帝传,清代其他人物传记也不在少数,如多尔袞、洪承畴、吴三桂、李定国、孙可望、和珅、慈禧、曾国藩、恭亲王奕訢、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等一大批知名人物都各被写成一种或两种以上传记。历代王朝中,像清朝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被撰写出传记著作来,确实不多见。况且还有更多的人物“集体”入传,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清代人物传稿》,此书以10余年之功,选定清代人物近千,各撰为长短不一的传略,由中华书局出版。所有这些,真实地展现出清代人物研究的盛况。

清代的专门史,诸如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民族史、边疆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音乐史、宫廷史,生活史等等方面,也各有专题著作出版,如1985年中华书局出的《清代宫廷音乐》、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的《清代宫廷生活》、198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的《清代满族服饰》、199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的《清代宫廷史》、199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清代饮食文化研究》、199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清代学术与文化》、199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等。可以想见,遍阅清史,几无空白处。诸如清朝服饰、宫廷礼仪、侍卫、清帝东巡、南巡等等活动,都作为专题展开研究,撰写成书,推向社会。

当清史研究伴随改革开放而变得火热之时,满族史研究同时急剧升温,从满族的故乡东北、从北京、从满族主要聚居地承德等地迅速走向全国。最早的一部《满族简史》,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金启琮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屯子调查报告》出版面世。其后,满族史的著作也不间断地涌现出来,其中,孙文良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于1986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国内第一部为一个少数民族编写的百科知识性学术大辞典,为满族研究、清史研究提供方便。2015年,李治亭主编的《新编满族大辞典》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前一辞典内容的补

① 李治亭:《清康乾盛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③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 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⑦ 周远康:《乾隆皇帝大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充和发展。两书的主体内容都在清史范围,实际是清代满族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总汇。我国历朝历代各拥有数额不等的诸多民族,至清代已拥有 50 多个民族,这些民族世代承袭,各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迄至改革开放前,学术界未曾为一个少数民族编写辞典,清史、满族史学界做到了,先后为清代同一个民族——满族编写出两部分内容厚重的大辞典。

与此同时,由李燕光主编的《满族通史》也于 1991 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最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满族发展史。满语虽然已在现实生活中退场,但以满文书写的文献却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满文文献的著作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如 1983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的乌拉熙春作《满语语法》,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商鸿达编《清史满语词典》,1991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的屈六生主编《满文教材》,1993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的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将清史文献中的满语词汇包括官爵名称等摘出,做出解释,这些著作都是前所未有过的全新成果。

满族史研究成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种,在满族文化、满族风俗、宗教信仰、文学、歌舞,还有满族家谱、民间故事、满族服饰、饮食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全面展示出满族的历史风貌。满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已独立成一门特殊的学术领域,称为“满学”。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其中心就是满族史研究,并办有《满族研究》《满学研究》等刊物。满学已走出中国,日、美、德、法、俄等国家都承认满学的学术地位,表明中国的满学已与国际学术接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

清史与满族 40 年研究成果中,论文之作有多少呢?精确统计,殊非易事。据著名学者李伯重提供的信息称,史学方面,以宋史论文为例,据统计近 50 年(1968—2018 年)内共发表论文 1.5 万篇,^① 平均每年发表 300 篇。清史研究 40 年可分前后期,以近 20 年为后期,比之前 20 年势头有明显回落,其论文发表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以近年《清史研究》统计的国内各文科杂志发表论文的目录为据,2016 年著录的论文近 600 篇,2017 年,没有多少增减,仍保持在 600 篇左右。这个数据,还不是最完整的记录。如已出的清史论文集之类就没有收录,还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文论,亦未计入内。就按《清史研究》所统计的年度论文数 600 篇为常数,近 20 年发表论文约为 1.2 万篇。前 20 年为清史研究高潮期,按保守数字来估计,每年平均应该达 1000 篇。总计应约为 2 万篇。合计 40 年,应为 3.2 万篇。清史比宋史论文统计少 10 年,但篇数还多出一倍余。顺便指出,在清史论文中不含“满学”的篇目统计。

清史研究 40 年中,清代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后清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清朝留下的文献档案之巨,可谓汗牛充栋。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存清代档案就达到 1000 余万件,包括历朝官员奏折、皇帝批示、官员任免、经费开支、战事军情,举凡中央各部门的一切文件都在其中。而在各省及市县,也都保留下数量不等的档案文书。此外,清代所修官书如《清实录》《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以及地方志书,也以千万计。清代大臣大多有遗著,包括奏稿、日记、学术研究文论及学者文集、私人著述,等等,多到难以计数!这是清代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政治与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前,这份遗产基本没动,只是保存而已。幸好“文革”中幸免于大难,只损毁了一小部分,但大部分仍然存留了下来。这些档案文献及各种资料,是清史研究不可缺少、又不可再生的重要原始资料。清史一经火热,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随之跟进,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首,不断将馆内档案以专题整理出版。1981 年,由中华书局先行出版《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1983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出《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年,辽宁省档案馆组织翻译满文档案,编成《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由辽沈书社出版。

1985 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满文档案,编为《清雍正朝镶红旗档》出版;1987 年,

^①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 年第 3 期。

天津古籍出版社将满文汉译的《天聪九年档》出版；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雍乾两朝镶红旗档》；1988年，辽沈书社出版了《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等。《满文老档》是清前史的一部多卷本的实录，史料价值极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将其全部译成汉文，于199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编成了另一部《清代档案丛编》，从1978年编第一辑开始，至1992年已编到第十四辑，统由中华书局出版；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编印了《清史资料丛刊》共14种，自1979年至1982年全部印出，为清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编》上编，不久又编出下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原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以《长白丛书》的总书名，专门编选东北清代所遗文献，自1982年启动，历15年，已出版120余种，在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于20世纪80年代，将《清实录》中有关东北地区的史料辑出，编为10本出版。在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也在做资料整理工作，从《清实录》中辑出有关清代内蒙的史料。

从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纂修新清史工作开始，至今15年间，把清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内部统计，截至2018年2月，共出版档案文献、名人文集、方志、外文史料、当代学者著述等，共234种，3570册。这里仅列举几种重要的史料辑，如《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2种，2429册；《清代诗文集汇编》801册；《新编清代稿抄本》50册，5400万字；《康有为全集》12册，851万字；《李鸿章全集》39册，2800万字；《张之洞全集》12册，1200万字；《清道光至宣统粮价表》23册，1693.4万字。这只是从中随便挑出几种，以见证纂修清史过程中整理与出版清史资料的空前盛况。如果将已出版的文字总计在一起，直追《四库全书》9.9亿字。清史研究40年，从冷清变得热潮迭起，已成为诸断代史中的一门“显学”。

三、清史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与分歧

清史研究40年的学术实践，实质就是不断正确认识清史的过程。研究愈深入，认识愈深刻，而不同的认识也会趋于认同，此即清史研究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1. 清史研究40年所取得的学术共识举要

其一，清史由三段式分割的历史变为三段合一的全史。改革开放前，清史被切割为三段：1644年清入主中原前，上溯至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计61年，称“清前史”；自入关时起，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清史”；自鸦片战争爆发，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这一段71年史，称“近代史”。清前史部分，学术界把它归入明史范畴，不算清史，而真正称清史就是中间这一段历史。

将一代王朝分作三个阶段，自无疑议。但将前段、后段从清史中分离出去，正如将一个人的早期历史与晚年历史跟本人分离一样荒谬，不近情理。直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才意识到，将清史分割是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于是才开始将三者合为一体。郑天挺主编的《清史》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与战后的近代历史部分，“二者……是不应相互取代的”，提出“要把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去进行研究”^①。冯尔康先生在为《清朝简史》所作的《序》中，明确反对“将清史拦腰截为两段”，使一部清史前后不通，主张应“保持清朝历史的完整性”。^②不过，他们只说了后两段清史如何处理的意见，但对清入关前史如何对待，并未表示意见。实际上，他们编写的清史都将三段或三者视同一体，全书内容已将三段历史作为清朝的“全史”，连贯地阐述清朝历史的全过程。^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尤其明确界定清朝“全史”的时间断限，与上文引证的说法完全一致。这

① 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绪论”第1-2页。

② 冯尔康：《〈清朝简史〉序》，载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③ 李洵等：《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一切都表明,清史学界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开始改变以往言必称“近代史”的状态,改口称“晚清史”。

其二,如何认识和评价清王朝?这是研究清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应给予清朝以明确的定位,否则,清史的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解释明白。应坦率承认,1949年以来,迄至改革开放前,从学术界到社会,对清朝评价甚低,对它的历史贡献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清史研究的展开,人们的观念进一步改变,对清史的评价已发生重大变化,基本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清朝完成了国家“大一统”,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国的疆域版图,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新格局;实行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建立了一套从内地到边疆的全新的管理体制;实行改革,不断弃旧创新,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皆有新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发展而达到历史上的高水平。这些正确的认识,以及据此而构建的对清史的叙述,在出版的各种详略不一的《清史》著作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其三,对康乾盛世的肯定性认识。康乾盛世是清朝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个“盛世”,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创造的。三朝历134年,正好占清朝268年的一半。去除兴起与衰落的首尾两段时间,“盛世”占有时间应为百年左右。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康乾盛世的评价并不高,多持怀疑态度,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康乾盛世的肯定性意见占据主流地位,如冯尔康先生说:“康乾盛世,疆域稳定,最终奠定了我国版图。后世不肖,领土时有丧失,但是大体上保持国土的完整。”又说:“中国版图底定,国人受惠至今,自不能忘掉清朝的功绩。”清朝的诸多重大建树几乎都是在康、雍、乾三朝完成,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决策的提出与实施,就是在这—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同类的观点、评价与认识,在多家《清史》中都有详尽的表述,承认和肯定康乾盛世,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

其四,对洋务运动的正确认识。洋务运动曾被认为是清朝自我挽救危亡的一种对策,认为它的仅仅就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因而史学界曾对其主要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改革开放后,由于学术视野的扩大,学者们开始重新认识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这场“运动”,定位其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中国社会真正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主要否定而转为全面肯定。

其五,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天经地义,神圣而不可侵犯!改革开放后,几经反思反省,逐步形成主流意见:两大革命运动不能否定,其落后而不合时宜的政策指向与实践,亦不能掩饰。在清代屡屡发生的农民及其他阶层参加的武装暴动,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问题的性质,给予不同的定位。有的确属正义性,实为反抗当地官府的欺压而举行的武装暴动,可称为“起义”,不属于这种情况,可称为“起事”,或称某某“反清”,较为中性。这些新说法、新处理办法,打破了改革前“一面倒”、以主观代替客观的旧观念,改为客观立场,不带有任何主观意图,不去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用事实说话,以事实为据,做出客观判断。

其六,对清代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事关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过去,我们一说到边疆与民族,就会痛斥清朝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政策,肯定和赞颂边疆少数民族对清朝反抗的正当性。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观念又为之一变,抛却“民族压迫”的简单化概念,改用“治边”或“管理”边疆诸方略的提法来研究边疆民族问题,如何巩固对边疆的统一,才是问题的本质,直至当代,这个本质问题也不会改变。在近三四十年内,已出版的各种《清史》中,包括大量的相关论文,都贯彻了这一指导原则,坚持国家“大一统”的理论,用以解读边疆民族问题,获得正确结论。

其七,关于清代人物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前后对于人物评价的变化甚大,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但是在学界逐步达成了共识,给予一致的评价。如清朝共历十二帝,其中努尔哈赤、皇太极、顺

^① 冯尔康:《〈清朝简史〉序》,载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治、康熙、雍正、乾隆六帝,被评为大有作为或雄才大略的人物;嘉庆、道光两帝,才能一般,但品格尚好,其节俭、勤政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光绪有勇气敢于变法,亦为人们所称道;稍差者则咸丰与同治两帝而已。多尔袞主政,决策进关,击败李自成、张献忠及部分南明政权,为清统一全国立下不世之功。他一去世,就被打入“逆案”。学界对此并不认同,而是重新梳理他的实践活动,给予全面肯定,但他专权造成的错误亦是造成其悲剧的主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近代人物评价的变化就更为明显,如曾国藩过去被评为屠杀农民军的“刽子手”,予以否定,而今他被认为是清代治家修身的一个典范;对左宗棠的评价,因为他镇压太平军、陕西回民起义,过去被定为一个反面人物。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才从他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基点上予以正确评价,认为他力主收复新疆,并率军赴新疆彻底打败入侵者,阻止沙俄侵占新疆,终于保住这块辽阔的疆土,此一功劳,名垂史册!论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

40年的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是观念的变革,因此才带来了学界对清史诸多问题认识上的大变化。以上所举,不过几个例证而已,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只有去读几种《清史》,才能获得对清史的全新认识。

2. 清史研究40年的学术分歧与异议举要

改革开放,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机,确已形成多方面共识,反映出清史研究的显著进步,但也无须隐讳其中的诸多歧异。产生歧异,大抵基于两种情况:一是出于对史事有无或真假的认定。有其事,其结论自然成立;若无其事或其事不明,结论自然会改变。二是史事清楚,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史事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又源于学者的观念、立场及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

其一,对一些证据存疑史事的似是而非的论证。如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多尔袞?是清初重大疑案之一。疑就疑在缺乏足够的证据,多系传闻,今之某些学者捕捉种种遗迹,即认定下嫁是真。努尔哈赤系病死,抑或炮伤致死?孟森早有论证,因病而故,已为20余年来诸多学者所证实。但至今仍有部分学者坚持炮伤致死的说法。雍正皇帝是否夺嫡即位?自其即位时就起谣言,传为篡位。直到当代,学者们还在考证,还在争论不休。问题的关键在于,持夺位说者举不出直接的关键证据来,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史料依据。同样,反驳者也无力否定似是而非的证据。但双方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康熙帝已废太子,不再立嫡,雍正已无嫡可夺,要夺的话,又是跟谁夺呢?在无嫡的条件下,皇子都有资格竞争皇位,显然,雍正就是由康熙临终前选定。这个过程,是既简单又明确,今人非要无中生非,造成不必要的争端。

其二,对文献记载清晰的史事产生分歧性解释,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认识歧异。

(1) 清朝自皇太极实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民族政策。^①在扩建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后,将这项政策调整为“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②。后世继承者奉此项政策为国策,直至亡国。一般说法,只是把它看成是一项政策而已,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种说法,无视其存在,更不见实施的成效,认定是“征服中国”“征服汉族”等等。又如,皇太极提出“满、蒙、汉一体论”,这是清朝对历代传统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今之学者对此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未达成深刻共识。只要稍稍回顾历代历史,不难做出解释。自周秦以来,历代坚守“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严华夷之防,严格区分华夷。皇太极提出“满、蒙、汉一体”的思想,是首次突破“华夷之辨”之成说,具有划时代的首创之义!以此为开端,才有后来康熙、雍正提出的“中外一视”“天下一家”大一统的思想,才使中华民族的旧有格局发生天翻地覆之变!

(2) 清军入关是明清交替过程中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种说法是,清军入关是历史的必然,而

^① 《清太宗实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②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条,载《清太宗实录》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认为是偶然性,即吴三桂联合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绞杀了李自成农民军,窃取了胜利果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清军入关夺天下,是皇太极在世时就确定的既定方针,其早已为入关做好了充分准备。清军入关并非是吴三桂“请来”的,而是恰在清军出征北京途中与吴三桂前来“请兵”这个偶然性事件相遇,促成双方联合。有吴三桂这个“因素”,才使清军改变行军路线,直驱山海关。从理论上说,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清军入关就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例证。

(3) 清朝入关后所进行的战争,是国内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征服”?改革开放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发生很大变化,多数《清史》明确表达见解:清入关后,“立即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①。有的列专题《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展开论述。^②不同意见则说:顺治帝迁到北京后,“发动了征服全中国……的战争”^③。统一与征服,其结果没有差别,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征服”适用于一国对另一国的战争,或境内外民族之间的战争,清作为中国国内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同农民军大顺、大西政权、南明诸政权之间的战争,都应平等地看待,他们都有权保卫自己,并去统一各方。我们只能接受其结果,不能否定一方为非法,斥为“征服者”。优胜劣汰,是自然之理。在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谁能重新统一中国,就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4) 对康熙帝废长城问题的认识。康熙废长城,一举打破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真正实现“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不仅是清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在多伦会盟解决漠北蒙古即喀尔喀(今外蒙)正式归入清朝版图后,康熙做出一个惊人的历史性决定:长城不再修理,不再派兵驻防,永远废弃。^④康熙废长城,宣布从此“无分内外,视为一体”^⑤,中国历史的格局为之一巨变。清以前,历代所行“大一统”,是奉行儒家所主“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辨华夷,分内外,以长城为限隔,实行内外分治,将边疆的“夷狄”置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之外,仅“官其酋长,随俗而治”^⑥,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这只是形式上的“大一统”,还未真正解决边疆的统一。康熙废长城、实行内外“大一统”,其重大意义尚未被大多学者所认识,对此未做任何解读,表明学术界对此缺乏认识,不明其意义所在。长城、“大一统”、华夷之辨,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三把钥匙。不懂三者之意,不能正确阐述中国史。康熙废长城,大破华夷之辨、实行新“大一统”,恰恰是这三个“关键词”构成清史的一条主线,也是清史的本质。

(5) 如何识别《大义觉迷录》,是又一个重大的问题。该书于雍正七年(1729)经雍正帝批准刊布的,是处理曾静反清案情的全部实录。大多学者视此当为清朝大搞“文字狱”的一个罪证,每当批判“文字狱”,无不引证这个典型的案例。部分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曾静图谋政治上反清,已远远超出文字得祸的意图。尤其重要的是,雍正帝不厌其烦地阐述他的民族观与新“大一统”的思想理论,运用此理论来批驳曾静所鼓吹的“华夷之辨”的陈旧思想。读罢此书,我们才懂什么叫“大一统”,才明白清代创新“大一统”的内涵,这正是《大义觉迷录》的精华所在,是最有理论价值的内容。这里,从雍正帝一系列论述中,引述其中一段话:“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⑦这段话,说得多么深刻!历数历代

① 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② 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③ 王戎笙主编:《清代简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15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21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19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⑥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⑦ 雍正:《大义觉迷录》卷1,载《清史资料》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此疆彼界之分”的陈旧观念、陈旧做法，一直未能统一夷狄，而清朝不分华夷、不别中外，却是实现了“大一统”！雍正帝刊布的《大义觉迷录》与康熙废长城密切相关，康熙从实践上突破“华夷之辨”的历史局限，实现了一次历史飞跃，那么，雍正则在理论上完成了清代新“大一统”理论的论证。与清以前历代所行之“大一统”划清了界限。康熙的这一实践与雍正的理论阐发，在已出的各种版本的《清史》中几乎略而不计，不予关注。对雍正阐述的大一统理论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能正确地认识雍正其人，更不能正确认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其三，最严重的一种歧见，莫过于一些学者用明朝与清朝做比较。如说“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清朝“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明“是当时的世界强国”，清统治“大约250年（应为268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250年”。^①这些说法，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学者头脑中的偏见与喜厌情绪所致，不值一驳。

其四，最不可与之讨论的一种歧见，这就是甚嚣尘上的美国“新清史”之种种奇谈怪论。以欧立德、罗有枝、米华建为代表，标榜“新清史”，被引进中国学术界，通过参与学术研讨、做报告、发文章，在一些地区或某些学术群体中掀起一股不大但很张扬的“新清史热”。他们打着“新视野”“新观念”“全球化”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满洲、将清史从中国分离出去，树立“满洲中心”，必“去中国中心化”“去汉族中心化”，“去北京中心化”。他们认为，满洲（族）是中国境外的“外来民族”。他“征服”了中国，也“征服”汉族，才建立了统治政权。所以，满洲不属于中国，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中国应是满洲的一部份。满洲皇帝也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内陆亚洲的大汗”！至于“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否认中国的真实存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重写本”，说清朝是“清帝国主义”，对于新疆等边疆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如此等等。这就是“新清史”的“精华”！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也无须多引，因为引述的“要点”，已经自我暴露无遗。每一个稍有点清史知识的人，稍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看明白“新清史”的观点已超出学术的荒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清史学界学者的批驳。^②“新清史”在中国“风光”了一二十年，现在却是风光不再了，不过尚有余音，仅此而已。

清史研究中的种种歧异，受文字限制，仅列举以上几例。从清史研究40年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共识与歧异并存，相生相克，永远不会完全统一，观点不会一律。经过讨论与争鸣，特别是经历实践的检验，消除歧见，有望达成共识。

四、对清史研究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展望

在历经改革开放40年后，清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将如何持续发展？回顾清史40年，当以前一二十年为极盛。至2000年前后，已趋平缓，在社会上形成的“清史热”稍减。2003年，随着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吸纳全国清史学者专家参与，由此掀起了新世纪初新一轮清史研究热潮。持续到2012年左右，各地学者承担的撰写任务已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清史纂修活动也趋于结束，其研究热潮随之而回落。以目前状况看，国内清史研究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期重视研究清朝通史，故清朝通史之作不断，无论清前、中、后期历史，皆有学者研究。眼前的状况是：基本转向清史的专题研究，通史、阶段史却变得冷清。如清前史即清入关前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北京的文科高校及研究机构已基本绝迹。就是在清朝创业发祥地，东北三省原是

^① 毛佩奇：《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考察》，《天津日报》2008年11月3日，第10版；毛佩奇：《明清易代与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3月3日。

^② 有关“新清史”的基本观点及中国学者的反驳，参见李治亭：《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评“新清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

国内清前史的研究中心，而今也少有学者过问。唯有沈阳故宫还在研究这段历史，每年组织大型研讨会、出文集，把清前史的研究继续下去。在南方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期还北上，参与重大学术活动，并与之建立学术联系。近年清史学术不过江，不再关注清朝京师及“三北”、中原地区的历史，而是多在做本地区的清史和海外贸易等问题研究。同样，北方也减少了对南方的关注。须知，清代疆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甚大，如只偏重一地，忽略其他地区，不见全局，就难以见清史全貌。所以，南北清史分离，不利学术发展，应当是南北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尤其有利于培育清代通史之才，一代史家才会应运而生！

第二，理论不明，是当前清史也是中国史学之通病。1949年后，我们摒弃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应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但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我们的观念包括理论也升级为极“左”，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极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批判唯心主义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我们的认识重归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史学研究逐渐弱化理论指导，在清史论著中再也看不到理论上的引经据典，亦难见理论思辨的痕迹。就事论事虽说不能揭示其本质，似乎还未脱离基本史实。严重的问题是，不顾事实，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或某种偏见，肆意改变历史的本来面貌。以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史学研究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必误入歧途，不能正确解释历史，“新清史”就是一个例子，清史及中国史学界都应对此保持警惕，不可盲目信奉。

第三，从近年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来看，属于重大问题或理论含量大的课题甚少，难以见到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除清代全史，不断推出新著，还有更多的大问题专论，而今却见不到类似题目的著作，研究选题“碎片化”问题非常突出。

第四，学术创新不足，亦是当前清史学术之不足。当改革开放初期，新出的《清史》断代，为前人所未见，就具有创新的意义。其他类专题、专著，以及论文，只要为前所未见，都属于学术创新。如果仍撰写与前已发表的论著同类内容，从框架设计，到观点的表述，以及方法的运用，皆有新意，或已超越前人，都应属创新之作，当无疑问。否则，就是重复而已。在经历了三四十年后，清史研究除了增添部分新史料，明显地缺乏学术创新。当清史进入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时，我们瞻望清史未来，充满了信心，又有几分忧心。我们已经有40年的学术实践经验，又产生了那么多可观的研究成果，又形成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尤其培养出一大批清史新秀俊才。这一切，都为未来的清史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清史研究的现状，如上已列举几个方面，都关乎清史未来的发展。能否保持清史发展的势头，就取决于我们对已出现的不足或弊病克服到何种程度。

我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即“经世致用”，是把历史当做治国的教材，将历史用于国家治理，“资治”而借鉴，如宋神宗给司马光著中国通史定书名为《资治通鉴》，充分表达了经世致用的主旨思想。所以，自汉代以后，代代王朝修史，至清代，已成二十四史大系列，其目的在此。当代，我们应承袭这一传统，从清史中获取经验教训。发展清史学术，争鸣必不可少。这些年来，学术界内一团和气，不争不驳，没有对错之分。自古以来，学术没有不争的，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历代学术皆有争论，互相辩驳，以此推进学术发展。学术的本质，就是辨是非，驳谬误，阐扬真理，引领社会思想走向光明。展望我国未来清史的研究，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成功，将决定清史的盛衰。除了他们自身的勤奋，必以极大的勇气扫除学术界中种种积弊，开拓出一条新路来。

责任编辑：尚永琪